

苏联文化政策的转向（1946 - 1956） ——《电话谋杀案》在苏联的排演风波*

庄宇**

【内容提要】苏联时期的剧院，是党政机关推行国民思想教育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导的苏联剧院，国家对剧本的内容有着严格的管理。从战后时期的政治思想高压到解冻思潮的开端，这期间，苏联剧院排演的戏剧也有着结构性的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台，代表着苏联官方文化解冻的全面开始。这一年，列宁格勒喜剧院排演的西方话剧《电话谋杀案》引发了苏联国内各方关注，苏联媒体就该剧所呈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苏共中央意识到文化政策导向的重要性，最终以党内新的文化政策的出台，确定了解冻的内在边界。

【关键词】苏联文化政策 苏联政治 《电话谋杀案》 苏联戏剧 苏联文化解冻

【中图分类号】D751.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1-0177
(17)

纵观苏联戏剧艺术发展进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题材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1933年2月12日，苏联作家协会创立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大会上，分管文化的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针对“社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解冻思潮’背景下苏联文化政策转型与列宁格勒地区戏剧管理研究（1953-1964）”（项目批准号：18CSS028）的阶段性成果。

** 庄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会主义现实主义”^①这一命题，再次进行了详细解读。2月28日，这份报告以《苏联戏剧创作的方式与任务》为题，发表在《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上。可以说，这份报告的内容奠定了苏联戏剧内容高于形式^②的基调，明确了苏联戏剧艺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苏联，剧院被视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苏联党政机关对剧院的发展进行较为严格的监督管理。意识形态的严格管理在二战后尤为突出。然而，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苏共二十大上“秘密报告”的出台，以及随后突然而至的“文化解冻”，大量西方当代戏剧电影进入苏联，带来了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审美。^③

① 这篇报道用了大量篇幅解释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手法对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提及戏剧创作，卢那察尔斯基强调“戏剧创作在文学中占有特殊位置。任何时候，当阶级斗争激化时，戏剧创作首当其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文学都为阶级斗争服务，那么戏剧则通过剧院战斗在第一线，戏剧非常直观，因此极具感染力，特别能影响人的情感，因此我们应当全面提升社会主义艺术对群众的作用——要特别关注剧院”。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剧作家必须要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才能创作出真正优质的戏剧。以上内容参见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Пути и задачи советской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8 февраля 1933.

② 报告中卢那察尔斯基的原话是：“当剧院给出一个新的戏剧展现形式，这当然非常好，但是这种新的戏剧表现形式必须建立在与社会内容互动之上，绝不能只是一种形式”。1934年苏联作协第一次会议后颁布实施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定义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据此可见，苏联时代，对于西方戏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内容思想性及戏剧表现的形式主义这些层面。以上内容参见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Пути и задачи советской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8 февраля 1933；及《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5页，转引自李新梅：“俄、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流变之比较”，《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8年春季号，第65页。

③ 解冻时期的文化政策及文化现象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该问题，俄罗斯学界已经有多部较有影响力的专著出版，如 Аксютин Ю.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 М.: РОССПЭН, 2010；Эггелинг В. Полити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в 1953–1970 гг. М.: АИРО-XX, 1999. 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及研究的深入，当代俄罗斯学界对解冻时期的文化研究关注焦点逐渐从中央转向地方。近年来，如 Блюм А. Как это делалось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Цензуры в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 застоя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и 1953-1991. СПб., 2005；Фетюков А. Б.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ласт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Ленинграда. 1956-1964 гг.) Автореф. дисс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СПб., 2012；Его же: XX съезд ЦК КПСС 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2011. №.4. С.183-186.国内学界对该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成

本文通过档案史料,对列宁格勒喜剧院在1956年这一特殊历史年份排演西方戏剧《电话谋杀案》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梳理自二战后到全面“解冻”这一时段苏联文化政策的走向与转向。

一、戏剧“解冻”与“剧本荒”

二战之后,为鼓舞苏联民众进行战后重建、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地位,加强了国家党政机构对文学艺术创作的监管。1946年,因《列宁格勒》和《星》杂志事件^①,联共(布)中央组织部(Оргбюро ВКП(б))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对文学艺术领域思想监管的决议^②。其中,8月26日颁布实施的《关于话剧剧院的剧目及其完善方法》(О репертуаре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театров и его улучшению)^③成为对战后苏联话剧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决议。该决议首先分析了苏联话剧院剧目现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苏联话剧发展的不足之处,即缺少反映苏联社会现实生活主题的话剧,因此导致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国剧目在苏联各大话剧院的剧目中所占比重过大。联共(布)中央认为,这是艺术事务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наркомe)及话剧工作者的严重政治错误。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剧院

果,如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杨海云:《赫鲁晓夫时期文化“解冻”研究——文学艺术知识分子命运》,长春:吉林大学,2010。

① 事件起因是列宁格勒的两家文学杂志《列宁格勒》和《星》在1944-1946期间刊登了左琴科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和阿赫玛托娃的诗《仿佛独白》。联共(布)中央认为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思想艺术性薄弱,散发负面情绪,因此决定就上述两本杂志事件对苏联文艺界进行整改。国内学界对这一事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如徐隆彬:

“从苏联历史档案看 20 世纪 30-40 年代苏联对文学书刊的事前审查”,《俄罗斯学刊》,2014 年第 4 期,第 78-86 页。

② 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针对文学艺术的思想性,于1946年8月14日、26日相继出台了《关于“列宁格勒”和“星”杂志的决议》、《关于话剧剧院的剧目及其完善方法》,1946年9月4日出台了《关于电影“伟大的生活”的决议》,这些文件中传达的精神对战后苏联文化政策的制定影响深远。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репертуаре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театров и его улучшению» от 26 августа 1946 г. См.: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 – ВКП(б), ВЧК – ОГПУ –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Под ред. А.Н. Яковлева. Сост. А.Н. Артизов, О.В. Наумов. М.: МФД, 1999. С.591-596.

排演外国资本主义作家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将苏联话剧舞台用来宣传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尝试用同苏联社会敌对的世界观来毒害苏联人民，使资本主义残余在人们的意识和日常生活中复苏。因此，艺术事务委员会让这种戏剧在剧院中广泛传播，并在舞台上排演这些戏剧，是艺术事务委员会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政治错误。^①”决议的最后给出了具体改进方案，即加大反映苏联社会苏联人相关主题剧目的比重，责成苏联各个剧院每年推出 2-3 部反映苏联社会现实生活的新剧目，由艺术事务委员会进行监督。此项决议一经施行，苏联话剧发展随即进入寒冬期。诸多经典的外国剧目被苏联各大剧院剔除，进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于苏联话剧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苏联话剧。

然而，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终结，苏联话剧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正如当代俄罗斯著名戏剧学家日特科夫（В.С. Жидков）提及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话剧发展特点时所指出的：“外国剧院团体开始通过铁幕之下的缝隙渗透进来，对这些被迫脱离世界剧院体系、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及被庸俗化了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的剧院工作者来说，显得异常清爽”^②。

1954 年 4 月 11 日，苏联著名导演科津采夫（Г.М. Козинцев）执导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在列宁格勒普希金话剧院进行了首演。这是《哈姆雷特》时隔多年后首次回归苏联舞台。继《哈姆雷特》之后，外国剧作家米勒、菲利波的话剧作品纷纷回归，外国戏剧团体——法兰西喜剧院、法国国家人民剧院、德国话剧院“柏林艺术团体”等也相继开始在苏联境内进行巡演。1955 年 12 月，英国话剧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偕同英国演员保罗·斯科菲尔德（Paul Scofield），在莫斯科为苏联观众带来了纯正的英式悲剧《哈姆雷特》^③。上述事件开启了外国戏剧，特别是西方戏剧全面回归苏联舞台的序幕。

1955-1956 年期间，大量外国戏剧得以在苏联剧院上演，除解冻思潮这

①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 – ВКП(б), ВЧК – ОГПУ –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С.592.

② Жидков В.С.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театр. М.: Изд-во лит. по атом. технике, 1995. С. 211.

③ Смелянский А.М. Предлагаемы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из жизни рус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М.: Аргист. Режиссер. Театр, 1999. С.18.

一重要时代背景外，戏剧发展的滞后所导致的“剧本荒”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20世纪五十年代，受战后严格思想管控的影响，苏联话剧出现了发展滞后的情况，文艺界也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著名苏联话剧评论家、曾任苏联戏剧杂志《剧院》（Театр）副主编的阿纳斯塔西耶夫（А.Н. Анастасьев）写道：“关注一下莫斯科剧院的海报，您会发现像《背叛者》（«Ванина Ванини»）、《生死线外》（«Мертвая хватка»）、《偷窃》（«Кража»）、《罪》（«Грех»）、《最后的感觉》（«Последняя сенсация»）和《被出卖的摇篮曲》（«Проданная колыбельная»）这样的外国戏剧^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松喜剧^②，如《新婚旅行》（«Свадеб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和《丁香花园》（«В сиреневом саду»），这些剧目经常在莫斯科剧院的海报上重复出现”。^③基于对莫斯科剧院的分析，阿纳斯塔西耶夫强调指出，这些剧目单中缺少反映当代苏联问题的正剧。他认为，很明显，现在的苏联话剧院脱离了现实生活，很少回应当代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造成了戏剧界缺少反映社会现实的高水准的苏联话剧作品。在阿纳斯塔西耶夫看来，这正是苏联话剧落后的标志。他认为，归根结底，苏联话剧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话剧是文学中最难的一个分支，大多数苏联话剧作家都没能成功地再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其次，剧院和剧作家们的传统关系被打破——剧院似乎成了客户、消费者，而剧作家成了供应商^④。同时，阿纳斯塔西耶夫痛

① 《背叛》是根据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短剧所改编的作品；《生死线外》是英国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的作品；《偷窃》是美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的作品；《罪》是波兰作家斯特凡·热罗姆斯基（1864-1925）的作品；《最后的感觉》是罗马尼亚作家米哈伊尔·赛巴斯奇扬（1907-1945）的作品；《被出卖的摇篮曲》是冰岛作家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1902-1998）的作品。

② 《新婚旅行》是苏联剧作家德霍维奇内（В.А. Дыховичный, 1911-1963）的作品；《丁香花园》是苏联剧作家索洛达里（Ц.С. Солодарь, 1909-1992）的作品。

③ Анастасьев А.Н. Перед поднятием занавеса// Театр. 1955. №2. С.22.

④ 这主要是指战后苏联盛行的“国家定制剧本”政策，该政策方便审查机构统一管理。按照该政策，剧本的创作需有国家戏剧管理部门向剧作家预定，之后统一向全国话剧院发送国家审核通过的定制剧本。这样做的结果，打破了传统的剧院与剧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了剧院管理者寄希望于国家行政部门，因而放弃了直接与剧作家沟通。1950年代后期，苏联剧院管理部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开始减少“国家定制剧本”的数量，让话剧院自行选用剧本，使得剧院与剧作家之间的突出矛盾得到缓解。尤其是在列宁格勒喜剧院和大话剧院，在著名导演阿基莫夫和塔夫斯塔诺戈夫的领导下，两个剧院培养出了多位固定合作的剧作家。

斥苏联某些剧作家走形式主义路线，为防犯错而停止了艺术上的探索，割断了同剧院之间的经常往来。

随后，1956年在《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戏剧和剧院落后的问题》^①的文章，该文中也反映出类似的观点。其作者纳扎罗夫（Б.А. Назаров）和格里德涅娃（О.В. Гриднева）认为，导致20世纪50年代苏联戏剧发展落后的原因集中在以下三点：首先，作家们没有足够的生活常识；其次，剧院与剧作家之间不良的沟通；最后，国家对戏剧艺术管理水平不足，令人不满。矛头直指苏联戏剧文化管理体制。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引发了党政机关的强烈批判，认为二人的文章是出自反列宁主义、反苏的立场。

综上所述，由于战后的高压管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戏剧正处于一种堪称“戏剧饥荒”的状态，即，优质的苏联戏剧太少，仅凭现有苏联戏剧作品不足以支撑正常话剧季的剧目单。在“解冻”的大时代潮流之下，很多剧院为吸引观众眼球而选择彩排部分小成本的外国戏剧，以弥补剧目的不足。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这一势头更盛。于是，排演外国戏剧这一趋势在1956年达到了顶峰。英国剧作家诺特（F. Knott）的《电话谋杀案》，就是在这一年列宁格勒喜剧院面临剧荒和财政危机的时刻，登上了苏联舞台。^②

① Назаров Б.А, Гриднева 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тставании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и театр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56. №.5. С.85-94.

② 该剧改编自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诺特（Frederick Knott）发表于1952年的剧本。诺特的这部话剧早在1954年就在西方名声大噪，主要是因为著名导演希区柯克将诺特的话剧改编为电影《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当时风头正劲的好莱坞影星格蕾丝·凯莉担任了这部悬疑电影的女主角。该剧本的故事脉络十分简单，前网球手汤尼发现富有的妻子玛戈出轨于侦探小说作家马克，于是策划了一宗看似“完美”的谋杀案。他找来旧校友列斯帮忙杀死妻子，谋夺其遗产。然而，弄巧成拙，在谋杀实施的过程中列斯不幸身亡，于是率先到达现场的汤尼伪造证据，指证是玛戈谋杀了列斯，以此达成夺取玛戈财产的目的。最终在小说家马克和警方一系列推理下，案件真相大白，玛戈洗清嫌疑，汤尼锒铛入狱。1956年，苏联多个剧院上演了这部话剧，译为《电话铃声》（The telephone ring, Телефонный звонок）。

二、列宁格勒喜剧院与《电话谋杀案》的排演

列宁格勒国立喜剧院（以下简称“喜剧院”）系苏联时期共和国级别^①剧院之一，其前身是讽刺剧院，1931年讽刺剧院与喜剧院合并。剧院的创作风格真正确立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1935年，极具天赋的青年导演尼古拉·阿基莫夫^②（Николай Акимов）的加入，不仅使得剧院免遭关闭的危机，同时奠定了剧院明确的艺术风格——讽刺喜剧。在导演阿基莫夫的率领下，喜剧院不断探索，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拥有了一批稳定的观众群。

然而，1949年8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形式主义惯犯——评列宁格勒喜剧院的莫斯科巡演》^③的文章，再度令喜剧院的发展陷入困境。文章批评喜剧院不属于“取得较高成就的杰出的剧院和创作团体”。在莫斯科巡演期间，剧院演出的话剧是彼得罗夫（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的《和平岛》（Остров мира, 1947）。剧评人格拉果夫（Г. Грагов）指出：“在《和平岛》这部话剧中，表现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投机者——战争的教唆者，我们从这部话剧中看到了形式主义的影响取代了鲜明的、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形式（指社

① 苏联时期剧院根据行政区划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别为联盟级剧院（Союзный театр）；第二级别为共和国级剧院（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ий театр）；第三级别为州立剧院（Областной театр）；第四级别为市立剧院（Городской театр）。联盟级剧院由苏联文化部直接管理，共和国级剧院由下一级别类似联邦文化部管理（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等），州立剧院由州文化局管理，市立剧院由市一级别的文化局管理。笔者所研究的列宁格勒喜剧院作为共和国级剧院直接归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管理（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СФСР）。在翻阅档案时，笔者发现列宁格勒文化局对联盟级、共和国级、州立剧院等高层级的文化机构也进行监督协管。在实践中，各层级文化部门的职能有重合之处。

② 阿基莫夫（1901-1968），苏联著名导演，苏联人民演员（1960），1932年阿基莫夫凭借在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导演的《哈姆雷特》扬名戏剧界。

③ 苏联时期，“莫斯科巡演”是戏剧界的重大事件，代表着剧院的艺术地位。一般，在苏联取得较高成就的杰出的剧院和创作团体，照例会到莫斯科来进行巡演。剧院准备莫斯科巡演，就如同准备参与一场愉快的、意义重大的节日活动一般。参见 Грагов Г. Рецидивы формализма: о гастрольях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комедии в Москве// Правда. 5 августа 1949.

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手法——作者)”^①。文章指出，喜剧院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导演工作的失误——总导演阿基莫夫走形式主义道路，剧院鲜少排演当代苏联剧作家的作品，指责阿基莫夫推崇病入膏肓的老旧资本主义的艺术空想。“剧院以排演浅薄、空泛的西方沙龙喜剧为生。近几年确实排演了一些苏联剧作家的作品，然而，剧院对待苏联剧作家的戏剧，走的是形式主义路线。”^②同年8月15日，《苏维埃艺术报》（Совет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上刊登了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管理的艺术事务委员会对列宁格勒喜剧院事件的决议，决议中指责导演阿基莫夫所谓的“富有表现力的现实主义”是形式主义的艺术路线，故解除其喜剧院艺术总监一职。是年，阿基莫夫被迫离开喜剧院，调入列宁格勒新剧院^③工作。喜剧院在阿基莫夫离开后几度更换导演，戏剧创作风格不定，苏联剧评人、作家扬可夫斯基（Моисей Янковский）在《列宁格勒喜剧院》一书中，回顾喜剧院这段艰难时期^④时写道：“确实，自从阿基莫夫离开后，喜剧院就如同出海的航船没有了舵手，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飘摇，没有回头路，而前方是迷雾一片。”^⑤

这一境况持续到1955年，连年来喜剧院糟糕的财政状况，令其上级主管部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文化部实为头痛。相比1954年，1955年剧院的收入大幅下降——1954年巡回演出的票房平均收入是13375卢布，而到了1955年，平均收入仅为6658卢布，降幅达50%。1955年全年，喜剧院仅排演了3部新话剧，而且上座率较低，相比1954年，剧院上座率下降了50%。1955年底，按照计划指标（根据1954年喜剧院年度收入所制定）1955年全年剧院应完成439.6万卢布的收入，而年底结算实

① Грагов Г. Рецидивы формализма: о гастрольях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комедии в Москве.

② Там же.

③ 列宁格勒新剧院（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Новый театр），1933年创立，1953年更名为列宁格勒苏维埃剧院（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театр им. Ленсовета），现为圣彼得堡国立列宁格勒苏维埃剧院。

④ 扬可夫斯基在1968年出版的《列宁格勒喜剧院》一书中，将1949–1955这段时间称为喜剧院的“艰难时期”。

⑤ Янковский М.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театр комедии. Л.: Искусство. Ленингр. отделение, 1968. С.92.

际收入为 357.5 万卢布，亏损 82.1 万卢布，亏损率达 18.7%。^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喜剧院已经严重拉低了列宁格勒文化单位收入指标。因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在 1955 年底对列宁格勒喜剧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所有的人员调整都是由主管部门自上而下进行人事任命。11 月 29 日，文化部出台调整方案，由剧院的副经理图马尔金（И.И. Тумаркин）取代现院长洛托舍夫（И.М. Лотошев）暂代执行经理一职；此后不久，文化部长祖耶夫（Зуев）任命导演阿基莫夫^②担当喜剧院艺术总监一职，12 月 6 日扎克斯（И.Т. Закс）被任命为喜剧院经理。

人事任命刚刚下达，喜剧院的新一代领导成员就开始着手改善喜剧院的财政状况。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在 12 月 25 日之前制定新一年的演出剧目单。新的剧目单制定非常重要：其一，剧目单直接关系到下一年剧院的财政收入；其二，排演的剧目必须符合剧院管理部门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20 世纪 50 年代，列宁格勒市文化局（Управле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Ленгорисполкома）要求，反映当代苏联题材的戏剧在剧院剧目单中必须占有较大比重。如此一来，喜剧院不得不几次修改剧目，以迎合文化局的规定。最终出于经费、演职人员安排等方面的考量，6 月底，喜剧院艺术委员会勉强同意加入了一部小成本的外国剧目——《电话谋杀案》。《电话谋杀案》这部外国戏剧添加到最终剧目里的原因有二：第一，充实剧目单，缓解剧院财政危机，以大胆创新的“实验剧”增加上座率；第二，剧院从 7 月底开始在阿基莫夫的带领下到莫斯科巡演，为了合理安排演员及经费配置，所以选择了一个成本较低、二线演员参与较多的剧目。由于前两年的财政赤字，此时对喜剧院来说并无更好的剧本可以挑选。因此，剧院经理扎克斯和导演阿基莫夫一再强调，《电话谋杀案》并非喜剧院的主打剧目。

然而，《电话谋杀案》投入虽小，却因其内容较之正统“苏联戏剧”具

^① Приказ №.80 По Главному управлению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РСФСР от 28 февраля 1956 г.// ЦГАЛИ СПб. Ф.105. Оп.1. Д.419. Л.24.（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艺术事务局 1956 年 2 月 28 日第 80 号命令，圣彼得堡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号 105，目录号 1，案卷号 419，页码 24。）

^② 阿基莫夫曾于 1935-1949 年担任列宁格勒喜剧院的总导演和艺术总监。

有新意而吸引了大批观众，为剧院带来了相当高的票房收益。因此，喜剧院在新任剧院经理扎克斯及艺术总监阿基莫夫的领导下，大胆革新，最终得以在1956年第三季度就实现了盈利，超额完成了52.4万卢布的收入。但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剧院管理机构及苏联媒体对该剧思想性和喜剧院管理人员的责难。

苏联媒体率先开始了对以《电话谋杀案》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的批判。1956年10月16日，剧评人马尔琴科（Т. Марченко）发表在《列宁格勒真理报》（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各界人士对此剧的关注。在题为《剧院季的首演》一文中，马尔琴科强烈批判在1956年秋新一轮话剧季中，列宁格勒各大剧院排演了太多从意识形态到艺术性都极差的外国戏剧。喜剧院的《电话谋杀案》无疑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关于这部话剧，马尔琴科写道：“在喜剧院新剧的海报上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场景，一个人强有力的手指正伸向牺牲品的喉咙。一位身着白色薄衣的女性，此刻正在接听电话，并未发现谋杀者。犯罪行为正要完成。”^①马尔琴科指出，虽然剧院意图将这部话剧展现为一部讽刺喜剧，然而该剧导演并未成功，反而是排成了一部反映典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剧，从根本上来说，与苏联的道德观背道而驰。

同年12月，列宁格勒市古比雪夫区（Куйбышевский район）^②党委书记基尔萨诺娃（В.Н. Кирсанова）指责喜剧院不负责任地挑选外国剧目，对苏联青年人造成了极大的反面影响。在1953年12月13日列宁格勒市党委全体会议上，基尔萨诺娃指出：“我们的青年人期待从剧院、电台、电视台这类文化教育组织中收获反映我们自己当代人生活的高艺术水准的话剧、广播和电视节目。某些剧院在挑选剧目时放低了门槛，因此最终剧目单里混进了大量与苏联道德观背道而驰、甚至对青年教育有害的话剧作品。比方说话剧《电话铃声》^③，这部话剧延续了美国强盗文学的传统。仅仅在10月份，

① Марченко Т. Премьеры начала сезон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 16 октября 1956.

② 苏联时期列宁格勒行政区域划分，该名称于1936-1994年间使用，现为圣彼得堡市中央行政区的一部分。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市主要话剧院集中在这一区，其他著名话剧院还有普希金话剧院、列宁格勒大话剧院等。

③ 即《电话谋杀案》。

这部话剧演出了 10 次。”^①这段评论发表的第二天，即 12 月 14 日，《列宁格勒晚报》（Вечерний Ленинград）刊载了基尔萨诺娃在党委会议上的发言，题为《关注青年教育——列宁格勒市党委全体会议》^②。一时间，列宁格勒喜剧院因排演《电话谋杀案》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可以说，基尔萨诺娃的发言给《电话谋杀案》定了性，不仅仅是媒体所评价的“从意识形态到艺术性都极差的外国戏剧”，而且被贴上“公式化陈腐的侦探小说”、“美式漫画”、“低俗文学”、“美国无耻文学”和“资本主义低俗侦探小说”等带有阶级属性的标签。

1956 年 12 月 28 日，苏联文化部部务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当前剧院季话剧剧目缺陷》^③的决议，指出艺术工作者必须要注意当前剧院季在剧目挑选上出现的严重不足，某些剧院出现了质量低下的译介作品，这些话剧作品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主义艺术的思想审美原则。《电话谋杀案》就属于“追求廉价趣味”一类的话剧作品。

1956 年底，列宁格勒剧院事务主要管理机构——列宁格勒文化局，也在年终总结里对本年度各大剧院所上演的大量外国剧目表达了不满：“在共和国级剧院中（指喜剧院——作者），剧目中 30%是苏联当代题材的作品，45%是外国戏剧。这表明，降低对苏联当代题材戏剧作品的排演，业已成为各大话剧院新的剧目单中的主要缺陷（1955 年苏联当代题材作品在剧目单的比重占到了 47.6%）”^④。

①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ленума от 13 декабря 1956 г. «О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е среди молодежи»// ЦГАИПД СПб. Ф.25. Оп.73. Д.42. Л.119. (1956 年 12 月 13 日全体会议记录《关于青年教育工作》，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全宗号 25，目录号 73，案卷号 42，页码 119。)

② Заботливо воспитывать молодежь. Пленум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Вечерний Ленинград. 14 декабря 1956.

③ Решение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СССР от 28 декабря 1956 г. «О недостатках репертуара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театров в текущем театральном сезоне»// ЦГАЛИ СПб. Ф. 105. Оп.1. Д.416. Л.240. (1956 年 12 月 28 日苏联文化部部务委员会决议《关于当前剧院季话剧剧目缺陷》，圣彼得堡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号 105，目录号 1，案卷号 416，页码 240。)

④ Отчет о работе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ы Исполкома Ленгорсовета за 1956 год// ЦГАЛИ СПб. Ф.105. Оп.1. Д.426. Л.14. (1956 年列宁格勒文化局年终总结，圣彼得堡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号 105，目录号 1，案卷号 426，页码 14。)

1957年1月3日，评论家伊扎科夫（Б. Изаков）在苏联著名文艺评论报纸《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上发表题为《关于低级趣味与责任感》一文，1月4日《真理报》对该文进行了转载。伊扎科夫指出，“苏联观众对当代外国戏剧展现出一定兴趣，这是合理的”，但同时，基于现阶段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他强调：“艺术活动家们必须谨慎挑选外国作品”，让苏联观众看到“高艺术水准的外国作品，而不是缺乏思想性的低俗小说”^①。如此一来，到了1957年初，话剧《电话谋杀案》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三、《电话谋杀案》排演风波之后的反思

实际上，苏联文化部对外国剧本有着严格的审核程序。《电话谋杀案》这一剧本是通过了苏联文化部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②的文字内容检查的，并取得了排演许可。^③因此，该剧出现在苏联话剧院舞台上并不是意外事件。从列宁格勒文化局的档案资料来看，笔者并未发现对《电话谋杀案》导演苏哈诺夫（阿基莫夫的助理导演）、喜剧院经理扎克斯和总导演阿基莫夫的任何处分。仅找到了几份剧院经理在基层党组织对排演该剧的原因的解释说明。当然，在这些说明中，剧院经理都承认了剧院在选择剧目上的失误，并做了深刻检讨。《电话谋杀案》的排演虽引起了较大的风波，甚至有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导演阿基莫夫授意下排演的话剧——苏哈诺夫一直是阿基莫夫在喜剧院的亲密朋友，是阿基莫夫又在走形式主义路线。但从苏联党政机关对此事的处置上可以看出，这次事件针对的并非阿基莫夫导演本人，而是以《电话谋杀案》为代表的西方戏剧。因此，笔者认为，1956年这一特殊历史年份苏联及其外部局势的变化是值得进行深入探究的。

谈及1956年的苏联，历史学家卢里耶（Л. Лурье）指出：文学和剧院生活、法捷耶夫自杀、摩登一族、爵士乐、苏联出兵匈牙利等等事件，都成

① Изаков Б. О дурных вкусах и чувств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3 января 1957.

② 艺术事务委员会原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1953年苏联文化部成立后，艺术事务委员会并入文化部管理。

③ 苏联时期，话剧上演必须得到文献出版事物总局（Главлит）的排演许可（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постановку），《电话谋杀案》无疑拿到了这份许可。

为历史记忆，印刻在人们心中。由此可见，1956年正是西方文化强势进入苏联的一年。生活在信息相对闭塞的苏联，由于官方正式宣告解冻开始，在这一年，青年群体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非常多的外来文化冲击。苏联出兵匈牙利事件，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引发了较大反响。在列宁格勒的高等院校中，不少青年组织开始筹备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的游行。这一年，9名青年学生在列宁格勒被捕，他们在外语师范学院的学生戈利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оликов）和普斯滕采夫（Борис Пустынцев）的领导下，在外语师范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赫尔岑师范学院、“十月”电影院等地，散发写有《支持匈牙利起义者！强烈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字样的传单。^①很快，党政机构也意识到了青年群体中的思想异动，于是在1956年底开始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坚决抵制与苏联意识形态相悖的文化传播，控制反苏情绪的蔓延。期间，列宁格勒国立技术学院排演的学生独幕剧《椴树蜜汁》（Липовый сок），也因内容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被列宁格勒文化局禁演。据此，可推断古比雪夫区党委书记基尔萨诺娃12月13日对喜剧院排演该剧的批判是有所指的。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代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美国强盗文学”在苏联的传播，对苏联青年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为应对西方文化冲击造成的后果，1956年12月19日，苏共中央出台了致各级党组织《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压制反苏敌对分子的攻击》的公开信。其中提到，“就是有这样的‘共产党员’，置党性于不顾，在与个人崇拜后果斗争的大旗下，自己站到了反对党的一派中，放过了一些蛊惑性的反党抨击，出现了对党的路线正确性的怀疑。”^②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界定“个人崇拜”和“党的领导”二者间的区别，针对部分作家、艺术家、作曲家、高校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之中出现的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路线、反对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等不良情绪，警告文艺界人士不要举着

① Аксютин Ю.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 М.: РОССПЭН, 2010. С.236.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Письмо ЦК КПСС к партийны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 «Об усил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массах и пресечении вылазок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враждеб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19 декабря 1956 г. П №.66/9 Строго секретно. <http://www.coldwar.ru/hrushev/postanovleniye-ob-usilenii-politicheskoy-raboti.php>

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来进行反党活动。提醒党员群体任何时候都不应放松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1957年1月4日，在列宁格勒作协党组织讨论《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压制反苏敌对分子的攻击》的非公开会议上，列宁格勒作协党组成员明（Е.М. Мин）再次提到了话剧《电话谋杀案》。他指出，虽然阿基莫夫是位天才导演，但这部话剧思想内容上实在差强人意，却意外通过了文化部的审核。作协党组书记卢戈夫采夫（Н.П. Луговцов）在会议总结中也指出：“明同志对《电话谋杀案》这部话剧的评价非常正确。应当说，前一段时间对这部作品的宣传不断扩大。我也看了这部话剧。第一幕非常无聊，第二幕——人如何被杀，第三幕——侦探破案”。^①言语间，卢戈夫采夫也透露出对该剧本思想内容的不满。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当遭遇思想信念危机时，《电话谋杀案》自然成为苏联党政机关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至于给《电话谋杀案》贴上“美国漫画”、“美国强盗文学”等标签，也是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下的苏联政府的被动应战。《电话谋杀案》虽然遭到苏联官方的激烈批判，但不得不承认，这部话剧受到了列宁格勒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演员弗洛林斯卡娅（Елена Флоринская）的回忆录中，她清楚地记得：“（1956年——作者）剧院的财政情况异常糟糕。阿基莫夫没来之前，人们都不再去喜剧院看剧了。正是阿基莫夫让剧院复活了。整个九月他带着《危险的转折》这部剧去莫斯科巡演，此时列宁格勒正上演《电话铃声》（即《电话谋杀案》——作者），几乎场场爆满。剧院里有了新生气。它充满整个城市。观众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又重新回到剧院中来”^②。

在笔者所查看的喜剧院档案文献中，在1957年5月20日至7月1日列

①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закрыт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партий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СП СССР 4 января 1957 г., посвященного обсуждению закрытого письма ЦК КПСС «Об усил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массах и пресечении вылазок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враждеб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ЦГАИПД СПб. Ф. 2960. Оп. 6. Д. 5. Л. 197–202. См.: Золотонос М.Н. Гадюшник,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исатель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енограммы с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М.: Новое лит. обозрение, 2013. С. 305.

② Лурье Л., Малярова И. 1956 год. Середина века: сенсацион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очевидцев: Сергей Хрушев, Рада Аджубей, 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 и др. СПб.: Нева, 2007. С.305.

宁格勒喜剧院“基辅-敖德萨”夏季巡演剧目单中依然可见该剧。^①直到1957年9月6日，剧院内部决议正式将该剧从剧目中剔除。^②据统计，这部话剧自1956年7月加入喜剧院演出节目单后，到1956年底，共演出了41场。^③至于1957年1月到9月间《电话谋杀案》是否还公开演出过，如今已无从考证。

结 语

自1953年起，苏联解冻思潮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逆。1956年“秘密报告”所带来的自上而下的全面文化解冻，其解冻的“程度”及官方认可的“解冻”底线，从当时列宁格勒地区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艺术工作者都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苏共中央倡导反对“个人崇拜”，那么斯大林时期所制定的标准就可以适当抛弃。这一时期，文艺界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也在试探官方的底线，而党政机关也在等待上层领导人的明确指示。因此，1956年戏剧《电话谋杀案》排演风波的出现，也为党内文化政策管理部门和艺术工作者们的探索设立了一个标杆，给大家一个警示——即所谓解冻也是有其内在界限的。从20世纪50-60年代苏联戏剧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关于话剧剧院的剧目及其完善方法》这一战后出台的决议，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其中某些规定（如禁止排演西方戏剧）被废止了，但自《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压制反苏敌对分子的攻击》决议中辨析了“个人崇拜”与“党的领导”的区别、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后，1946年决议中（《关于话剧剧院的剧目及其完善方法》）确立的根本性原则，也是后来苏联各大剧院选取剧目

①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от 3 декабря 1956// ЦГАЛИ СПб. Ф.261. Оп.1. Д.202. Л.14.（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艺术事务局1956年12月3日文件，圣彼得堡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号261，目录号1，案卷号202，页码14。）

② Приказ №.147 от 13 сентября 1957 г. п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театру Комедии от 13 сентября 1957 г.// ЦГАЛИ СПб. Ф.261. Оп.1. Д.241. Л.34.（列宁格勒喜剧院1957年9月13日第147号决议，圣彼得堡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号261，目录号1，案卷号241，页码34。）

③ Капралов Г.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афиши// Театр. 1957. №.2. С.145.

时的基本衡量标准。

列宁格勒喜剧院的兴衰，深受战后 1946 年到 1956 年苏联文化政策的影响。可以说，喜剧院的起落在整个苏联时代都非常有代表性，当时多数苏联时期的剧院及创作群体，始终徘徊在“党性（国家性）”与“艺术性”之间。虽然整个 1953–1964 年被史学界习惯性地称为解冻时代，但很明显，自 1956 年喜剧院《电话谋杀案》排演风波之后，列宁格勒多数文艺工作者还是采取了较为婉转、间接的方式进行思想和创作上的解冻。笔者认为，解冻初期的文化现象及这一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导向，对研究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苏联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学界对苏联历史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该问题将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theater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the party to educate citizens. In particular, for those Soviet theatr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ist realism”, the nation had strict ideological control over the content of plays. From 1946 to 1956, as cultural policies changed in general, theatrical repertoires were also rearranged with the reappearance of Western plays on Soviet stages. In 1956, after the “secret report” of N. Khrushchev was issued, the thaw in Soviet official culture officially began. It was in this year that the “Dial M for Murder” scripted by the British dramatist F. Knott was staged in the Leningrad’s Comedy Theater. This pla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many different circles of the society. The Soviet media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Western ideology, which was manifested in this pla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policies, and eventually issued a new cultural policy, which confirmed the policy of “thaw”.

【Key Words】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USSR , Politics in the USSR, “Dial ‘M’ for Murder”, Dramas of the USSR, the Cultural Thaw of the USSR

【Аннотация】 Театр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был важнейшей трибуной воспитания народа. Особенн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ировало творчество